



党史论谈

DANG SHI LUN TAN

曾成贵 著

DANG SHI LUN TAN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党史论谈

DANG SHI LUN TAN

曾成贵 著

DANG SHI LUN TAN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史论谈/曾成贵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 - 7 - 216 - 03531 - 6

I. 党…

II. 曾…

III. 文集

IV. D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148 号

党史论谈

曾成贵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张:13.625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插页:3

版次:2011 年 4 月第 2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342 千字

定价:30.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3531 - 6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自序

本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约莫十年光景。今与出版方商定，将其增订再版。一则充实若干篇幅，二则加以必要的修订。初版论文编成五组：第一、第二组主要论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史人物的思想理论；第三组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第四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共党史；第五组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与现实。此次增订，新编第六组，选用了几篇与中共党史关联的政坛人物研究文章，其他各组增补一二篇不等。增补的文章，三两篇为近年所作，其余的都在2002年之前完成。增订的工作，主要限于统一体例，改正错误，并没有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因此，除了篇幅扩充以外，本书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当初的学术面貌。书中加插照片，目的是扩充信息，并希望增添阅读兴趣。由于过去储存信息不完整，故未能将照片来源逐一列出。

近十年来，从事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因此，平常对这个学科的建设，也有一些思考。所形成的想法，有的是学习的结果，有的是实践的心得。下面，就把此前讲过和写过的想法，一并放在这里。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规定的学科范围是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但常会把括号内的对象省略。在现实生活

在史与论的关系上，本人认为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论述准确到位，深表赞同。史论关系可放在不同的范围内考察：一是将史与论作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两种社会现象加以考察，这里的史是指历史科学，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唯物史观。在这个范围内，论为史提供指南。二是在历史研究范围中考察，这里的史是指客观历史事实，论是指对历史过程和事实的认识，在这个范围内，只能是论从史出。三是在说明或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即从实务的层面来看史论关系，这里的史是指历史著作中所用的资料，论是指著作中的观点、论点。在研究结果已经得出以后，历史研究者叙述其成果时，处理史论关系，就可以不拘一格，既可以论带史，也可以先史后论，夹叙夹议，寓论于史。总之，以恰当地表达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宜。

毋庸讳言，目前，党史研究成果在学术交流中仍有受到质疑的现象。论者往往以政治家的论断为己见，以历史上的政治结论为定论，乐于再现高层的折冲樽俎，不厌其烦地复述文山会海的故事，芸芸众生的生活和思想难以进入视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不彰，主体作用不强，独立见解不见，或者分量很少，学术含量自然就不高。社会科学界总的任务是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一些学科，包括中共党史，既有基础研究的任务，又有宣传普及的任务。就研究而言，无疑应秉持问题意识，求异创新；就普及而言，是要把现有的结论，有说服力地传播开来，达到武装受众思想，凝集力量，实现既定目标的目的。此两者任务不同、目标不同、手段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把两者混为一谈，分不清哪是在研究，哪是在宣传，导致重复劳动，甚至简单复制，有文字产出，无研究效益，降低了

学科研究的质量和声誉。

话说回来，真正做到这些，也并非易事。然而，只要我们已经明白，就应设法坚持做去，至于成与不成，那就另当别论了。

值此本书付梓之际，请允许我由衷致意：

感谢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江苏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图情中心，以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党史馆，他们为查阅档案和图书提供周到服务；

本书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为应各研讨会征文而写，感谢各主办单位邀请与会，且多数论文被收入研讨会论文集。

感谢《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民国档案》、《学术界》、《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理论月刊》、《学习与实践》等杂志社，提供了宝贵篇幅发表拙文。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并同意增订。

感谢所有慷慨帮助我的人们！

2011年3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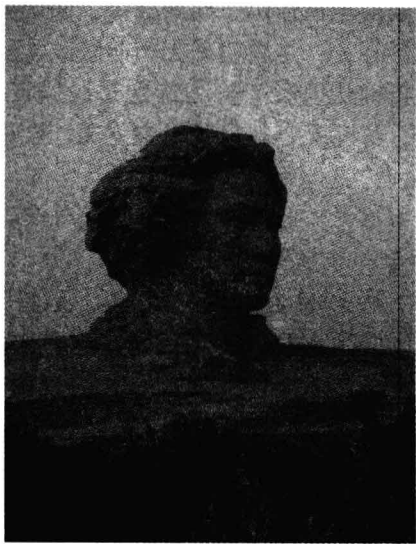
目 录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史的考察.....	1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论中国资产阶级之比较	15
六大后两年间毛泽东周恩来建党思想比较论	31
论毛泽东刘少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9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从刘少奇的思想中吸取什么	57
朱德论执政党的建设述评	67
试论邓中夏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75
陈独秀“冷静正视”北伐论质疑	88
北伐时期恽代英在军校的实践和理论建树	94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张闻天的心路历程	108
建国初期李先念的政治思想.....	120
中国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解析.....	132
中国大革命紧急时期的工人运动述评.....	142
试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	157
再谈 1926 年北伐战争的发动问题	213

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	226
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比较论·····	242
论鄂东北共产党在创建鄂豫边根据地中的作用·····	255
湖北抗战综论·····	268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高扬了爱国主义旗帜·····	283
论 1959—1961 年中共湖北省委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	294
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二题 ·····	310
“三个代表”：立党兴邦的伟大纲领 ·····	31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共统战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	341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考察·····	350
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纲领相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372
孙中山的政党建设思想述评·····	383
蒋介石辞办黄埔军校问题考述·····	392
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论纲·····	401
1938 年李宗仁白崇禧的抗战思想述论 ·····	411
参考文献·····	419
著作要目·····	430

陈独秀“二次革命”的主张占主导地位，即国民革命——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共应“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②。其后，又出现“无间断革命”论、“一次革命”论。如瞿秋白主张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主张超越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一省数省的胜利便是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说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要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一个在民主革命中捎带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反。总之，都没有找到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有几段论述卓尔不群，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元素。1925年11月21日，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联系之中



青年毛泽东（雕像） 摄于长沙橘子洲头

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③紧接着,他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中产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在当今国内外革命形势面前,它那“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④1926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辛亥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⑤。

这几段连贯一气的论述,说明毛泽东已得出几个重要见解:第一,中国革命有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左翼合作进行的;第二,国民革命后,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独家专政;第三,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这就形成了国民革命——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方案。

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胚芽。它的萌生有其实践的根据。继中共二大提出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后,三大又确定了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原则。在中共党内出现右倾而国民党内排共风潮迭起的情况下,四大提出了民族革命运动中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壮举体现了本阶级的伟大力量,而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则十足地显露了两面性。毛泽东正是在这一阶段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出上述见解。

1927年9月,毛泽东对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为之一变,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应当从速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并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⑥。这个判断,理论上来自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的观点,实践上

与民族资产阶级附和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动，国内一片白色恐怖相关联。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但也为时短暂。1928年10月，毛泽东接受了中共六大的正确分析后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未因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而改变，“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⑦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事实上也受了打击，共产党应该在在野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政派中寻求与党。他主持中央苏区政府工作时又指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⑧然而，就整个局势说来，苏区的工农民主专政虽然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具有不同的本质，但毕竟部分地严重超越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表现了较高的革命积极性。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再次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变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他指出：人民共和国“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其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革命的转变必须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时才能进行^⑨。显然，经过实践的检验，毛泽东的主张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所设计的轨道上。政权以工农为主体，革命转变须有特定的标准不能盲目，则是在土地革命中的新发展。

(二)

1936年到1940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成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酝酿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主根据地有

了一定的发展，并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了“三三制”，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成型，提供了事实根据。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总结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成文章的上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他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在性质上“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可能走资本主义方向，也可能转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应力争后一种前途^⑩。

在此，毛泽东阐明了两个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双重领导使命。民主革命中建立的政权，既“是”一般意义的民主政权，而又与一般意义的民主政权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把它列为第三种类型。这个区别很有意义。两种前途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力量占优势之前，如果讳言可能转向资本主义，只会导致放松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努力。指明存在两个前途，要求力争后一个前途，可以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陈独秀也说过两种前途，但毛泽东与之有根本区别。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题中应有之义。

1939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进一步明确。5月，他指出共产党的出现，使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它以前和以后“最重要的区别”，但总的性质没有变。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⑪这就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方向。

同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政治、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并且把两个革命的衔接关系提高到发展规律来认识。他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界定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政治上是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经济上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企业，实行耕者有其田，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因素也不断增长，这就使革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但互相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

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元素，诸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中共的双重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过渡的客观标准等，都已大体具备了。因此，194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得以凭借这些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理论材料，旗帜鲜明地全面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这个讲演于2月间由《解放》杂志刊出时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个讲演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既区别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在政治上，它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以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其领导；文化上，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他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不能在革命转变上犯急性病；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又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③。这就不仅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而且集中阐述了它的性质、特点、前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基本构成，正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科学理论系统。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立，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如前所述，中共在创立之初就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但至于怎样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彼岸，则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指导，心中既有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目前又能专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使革命得以避免“二次革命”或“一次革命”的错误。虽然不好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是普遍规律，但在中国，由于有了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强大的共产党的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体现其历史必然性，则是不争的事实。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立，表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马恩时代，这个问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列宁在1920年提出过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初步设想，但未形成成熟的见解。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总结了中国的经验，创造性地回答了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

(三)

1940年以后至1953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得以丰富、完善的阶段。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并踏上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里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同步形成阶段性发展，由一般理论原则而日臻细密、具体。

1941年5月，毛泽东提出判别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⑭，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局部到全局，波浪式地扩大开来。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初步形成了怎样过渡的思想。他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过去，他从对人民有利的角度谈革命转变的时机，在这里，他进一步上升到以生产力标准来说明问题，认为若无比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大规模的工业、与之相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新民主主义国家就不能巩固，“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⑮。

当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要由蓝图变为现实的时候，毛泽东又作了新的思考。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的几个重要思想，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了重大发展。第一，强调新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第二，指出新民主

主义国家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资产阶级斗争，一是竞争，二是没收，既与之斗争，又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第三，明确了过渡的基本途径，就是“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第四，指出政治独立后还要在经济上独立，而“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⑥，第一次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了时间规定。强调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中的领导作用，和对未来国内主要矛盾变换的预见，成为后来把建设和过渡两个阶段合而为一的基础。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紧接着，张闻天代表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提纲的修改，进一步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观点。其一，他指出，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其二，他指出，不能过早地、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不能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但对私人资本主义仍然要实行“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这一限制；其三，他指出，使合作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才能逐步做到^⑦。

在这些深思熟虑和集中智慧的基础上，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并得到了全会的确认。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第二，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分散的农业、手工

业经济，走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第三，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1949年9月，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在宪法颁布前起根本大法的作用，关于新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全国范围的实践得到根本保证。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过渡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客观上存在两种理解：一是指它属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阶段，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二是认为它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具体转变为社会主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按前一种理解，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过渡）——社会主义；按后一种理解，是新民主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国前夕到建国初期，毛泽东持后一种方案。

1952年，毛泽东关于过渡的思想发生了大转折。9月间，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他放弃了一举过渡的方案，采取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的方案。在湖北视察时，他对此用过桥打比方，说是走一步算过渡一年，10年到15年走完，在这期间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8月，在审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正式形成文字。12月，又在经他审改、中央批转发到全党的《宣传提纲》中对总路线的表述作了最后的规定。实行“一化三改”的总路线的确立，规定了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时间预定共18年。

毛泽东关于过渡思想的转折，也是有客观依据的。1947年